

“《歌德全集》翻译”项目：

规划与挑战

谢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5.08.13日 柏林自由大学讲座，简稿）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是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与欧洲最重要的诗人、剧作家和思想家，在德国文学发展史、德国思想史与精神史以及欧洲文学史上具有极重要地位。

作为世界文坛巨擘，歌德长期以来是德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倚持。其作品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方主要文化大国以及俄罗斯、美国与东亚诸国，均有广泛而深入的译介与接受。

歌德作品的汉译与研究在我国也早有源流，已有百余年历史，相关成果积叠盈尺。

中国与歌德初次的相遇，可以追溯到曾任驻德公使的李凤苞（1834-1887）。后者在1878年11月29日的《使德日记》中曾提及“果次”（歌德）之名；第一位汉译歌德作品的人当推王国维。他在1900年夏天依据英译翻译了德国物理学家海尔模塞尔兹的著作《势力不灭论》，内含歌德《浮士德》摘译；文学史上介绍歌德的第一人应属辜鸿铭。他先后在其英译《论语——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举例说明的独特译文》（上海：别发洋行，1898）、英文著作《尊王篇》（上海：别发洋行，1901）和《春秋大义》（北京每日新闻社，1915）中译引歌德等西方作家。在1910年出版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辜氏还翻译了俄特（歌德）的《自强不息箴》，以此来应和孔子之言。但歌德进入中国的公众视野，则有赖于赵必振据日文编本所撰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1903）等。这其中载有“可特传”（歌德传），详细介绍了歌德的生平、著作及其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而真正自德文译介歌德并对之有所体悟者，当首推马君武。马君武在其《马君武诗稿》（1914）和稍后周瘦鹃在其《欧美名家短篇小说》（1917）中，分别收入了歌德诗歌和小说的汉译。从那时起，中国的歌德译介，大抵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

1. 歌德作品汉译与歌德研究在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简述

1) 1920年之前歌德译介与接受的初兴

上提数位文化名人，将歌德带入中国接受语境，乃歌德译介与研究的先驱。他们或介绍歌德的生平与创作，或翻译歌德的诗作等。研究大抵粗疏，翻译多由自英语、日文等转译，并以文言出之。

2) “五四”之后歌德译介与研讨的高点（1920—1937）

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在信中，三人研探歌德并企望“先把他所有的一切名著杰作……和盘翻译过来……”。《三叶集》的问世，提示了歌德译介高潮的到来。

1922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全译本，取得极大成功。在当时的文坛上掀起了第一个“歌德热潮”。

截止1936年，歌德重要作品或节选的汉译有：小说、散文作品类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诗与真》、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释勒（席勒）与歌德通信集》；诗歌类如《歌德名诗选》、《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等；剧本类有《浮士德》（上、下部）、《史推拉》、《克拉维歌》、《兄妹》、《哀格蒙特》、《塔索》、《铁手骑士葛兹》等。这期间译介活动的代表人物包括郭沫若、周学普和张传普（张威廉）等。

而相关的歌德研究成果也蔚为大观。

大量解读歌德或关于歌德作品汉译问题的文章与论文被收录进各式文集。

对歌德生平与创作的开掘，也多有成绩。这方面的成果包括：柳无忌的《少年歌德》（上海：北新书局，1930）、黎青主的《哥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冯至的《歌德传》（1932年前）等。

总之，这一阶段对歌德的译介与研究，正与“五四运动”时期和其后内忧外患阶段学人与国人反对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思考民族命运等要求与努力契合，形成了与时代语境相关的歌德形象认知。但因受限于当时的翻译水平与风气导向等要素，不少译文显得比较粗糙、随性、生硬；而论述方面，虽不乏独特见解，但大多或不够系统和深入。

3) 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时歌德译介与探析的余波(1937—1949)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敌救国成为第一要务。歌德热在中国开始降温。比之前一时期，译文与研究论文的数量有明显减少。

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大多为重译。

新译部分则包括了杨丙辰所译《亲和力》（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刘盛亚所译《少年游》（重庆：群益出版社，1944）等。

歌德的书信也第一次引起了关注。1940年，《中德学志》第2卷分3期刊载了张德润自《释勒与歌德通信选集》中选译的115封信。

值得一提的是，《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迷娘曲》一诗颇受译者喜爱，并被田汉改编成独幕剧《眉娘》（1928），后又被陈鲤庭等人在此基础上改编为抗日宣传剧《放下你的鞭子》，引起极大轰动。

研究方面，因国难当头，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浮士德形象，则获得不少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部专著是冯至的《歌德论述》（上海：正中书局，1948）。

如果推举歌德译介与研究在此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可以包括冯至、陈铨和李长之等。

4)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时期歌德译介和研究的低迷(1949—1977)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大陆出版的歌德译作基本为旧译重版。其中包括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上、下卷）》等。

歌德作品的新译极少。只有一些短篇故事、诗作、格言或作品节选，载于《世界文学》（1959年第7期）、《德国诗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西方文论选（上、下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和《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等书刊或译著中。

评述与研究方面也是乏善可陈。有关歌德的少量文章散见于报刊杂志。

在“十年动乱”及其结束后的短时期内，大陆的歌德译介完全停滞。

而港台地区在1949至1977年近30年间，歌德的译介活动却十分活跃。

5) 改革开放以来歌德译介与研究的兴盛(1977—)

文革结束之后，尤其90年代以来，歌德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可谓枯木逢春，重又进入繁盛阶段。

译作方面，各色旧译、重译、新译迭出，题材、种类丰富多彩。据统计，自1977年至今，两岸三地出版的有关歌德的译作中，散文小说类约有275版，诗歌类（抒情诗、叙事诗）230版，戏剧类70版、书信集8部（其中1部辑录翻译最多者，为601封）。

这些译作中，《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士德》重印、再版、新译不断，依旧遥遥领先。在1981-2009年间，不同译者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本达26种；《浮士德》译本在1982-2013年间则为9种。

而《歌德谈话录》，自1978年至今，也已有20多个译本面世。

除了那些颇受青睐的叙述与戏剧作品外，歌德的诗作也是歌德当代汉译的一个重点与亮点。

新时期还译介出版了歌德一定数量的文学、艺术和美学等方面的著述以及格言、感想等，选辑为《文学风格论》（歌德等著，王元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程代熙、张惠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和《论文学与艺术》（范大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999年歌德诞辰250周年之际，歌德的作品得以以具有一定规模的文集形式出版。包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歌德文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歌德文集》（10卷）以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歌德文集》（14卷）。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歌德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要强似过去几个阶段的总和。具体见之于论文、专著、辞书、传记、文学史、教材与报刊文章。检索中国知网，1979年4月-2014年2月间，研究歌德或与歌德研究相关的杂志论文、报章评述或报道与硕士学位论文，达969篇；而1981-2014年间，歌德研究或介绍方面的单行本著述，也至少有18部之多。不仅歌德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大大提升，而且研究视角大大拓展，由以前的文艺学范畴，拓展至法学、教育学、生物学、物理学、色彩学、建筑学、音乐学、宗教学、伦理学等众多领域。

当然，文艺学研究依然是歌德研究的主体与核心。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 (1) 歌德作品文本分析。
- (2) 歌德文艺思想研究。这方面的论述主要探讨歌德对文学创作、艺术与哲学等问题。
- (3) 歌德传记要素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于歌德的传记撰述。
- (4) 歌德接受史研究。
- (5) 歌德比较文学研究。
- (6) 歌德译介者研究。评述主要检视歌德译介过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涉及马君武、郭沫若、宗白华、梁宗岱、李长之、杨丙辰、冯至、陈铨、绿原等人及其译作与著述。

此外，分别于1982年（歌德逝世150周年）、1999年（歌德诞辰250周年）、2009年（歌德诞辰260周年）召开的歌德纪念会与研讨会，也对推动歌德的译介与接受做出了很积极的贡献。

简要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歌德译介与研究迅猛发展。译介的数量与质量取得长足进步，相关研究的视角和范式颇有突破，研究的体系性与深度大有提升，而且，歌德的受众面也大大扩展。

2. 已有代表性成果的学术价值与问题

1) 歌德作品汉译

通过对歌德译介与接受史的梳理，可以概括地说：在20世纪初至1949年的近50年间，歌德作品的汉译至少包括长篇小说与自传4部、剧本7部、诗集3部，以及一些短篇故事和童话。而建国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歌德作品的汉译如火如荼。正如上提改革开放以来歌德译介与研究之繁荣局面所展示的，新时期的歌德译介，成绩可圈可点。其中，最引入关注的，要数3套歌德文集在纪念歌德诞辰250周年之际适时出版。具体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歌德文集》（10卷）【1999，关惠文（总序）】，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歌德文集》（6卷）（1999）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歌德文集》（14卷）（1999，杨武能、刘硕良主编）。这三套文集，应当说比较集中体现了歌德译介的最新成果，对歌德在中国的接受具有很大推动作用。

但我们在充分肯定文集的文化功绩之余，也不得不指出它们共有的一些问题：

- 重译现象明显。歌德重要作品的很大一部分，在建国之前已有译本，建国之后的相关汉译更是屡现重译之象。
- 比之歌德本人的创作，如果我们以1999年由经典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40卷）为参考基点，则可以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歌德文

集》(14卷)等,依然译出太少。尤其是歌德巨量的日记、书信(据1919年出版的魏玛版《歌德全集》,歌德的信函约有15000封)少有翻译,而其自然科学领域的著述等,除了《色彩学》前言有数千字的翻译外,国内可以说尚未启动汉译工作;

- 上述三套文集,虽各有总序或译序、译后记、题解与跋,但多属对歌德介绍性或体悟性文字;除了董问樵所译《浮士德》有笺注100多页这一孤例外,其余译本要么未加注解,要么就只有极少量译注和笺注。而在歌德汉译及其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二十一世纪,笺注本《歌德全集》,显然已成为传播和研究歌德作品、发展中国歌德学的必需。这是时代的召唤与机遇,也是我们新一代日耳曼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和使命!

2) 歌德研究与歌德汉译研究

我国的歌德研究与歌德汉译研究,在过去一百余年间的发展过程中,正与歌德的汉译一样,也是成果丰硕。具体见之于一系列重要著述。

早期的著作,可提宗白华和周辅成编的《歌德之认识》(南京:中山书局,1933)。陈铨所著《中德文学研究》(北平:商务印书馆,1936)虽是一部讨论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影响的开创性专论,但用了相当篇幅来探讨歌德与中国小说、戏剧和抒情诗的关系,考察细致,结论恳切。稍后出版的另一部重要学术专著,是冯至的《歌德论述》(上海:正中书局,1948)。相比前人的研究,冯至的选题更细致,论述更严谨,而且他注重文本考察,对老年歌德有特别深入的研究。

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歌德研究与歌德接受研究,颇有深入成果。

董问樵的《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分上篇“从翻译到研究”和下篇“西方的《浮士德》研究”。前者探讨浮士德精神、《浮士德》与歌德的精神和思想关系,后者考察浮士德题材史与《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等,是一部考证和论述较为严谨的学术著作;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1)讨论歌德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梳理了歌德对中国的认识和1982年前中国对歌德的接受;余匡复的《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研究浮士德与歌德的关系,从“歌德的精神发展史”、“《浮士德》主人公的精神发展史”、“《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这三个方面将《浮士德》解释为歌德的精神自传,认为浮士德的经历和精神发展诸阶段,反映了歌德的经历和精神发展诸阶段,而浮士德的理想,也正是歌德自己的理想。

而卫茂平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辟出专门章节,以史料考辨的方式,选取晚清民国时代的歌德译介史,进行了全面、详实的梳理考订。既梳理整体性的译介脉络,又着力刻画歌德核心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士德》的接受样貌,并钩稽郭译争论公案,且凸显歌德不同体裁作品汉译中的多个功臣,同时,他还客观分析了当时中国政治历史之变故、地域文化等因素对歌德译介的影响以及此中折射出的相关学者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眼光等;叶隼的《德国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以冯至的歌德研究为重点,探讨了2000年之前的歌德中国接受史;范大灿在其主编并撰著的《德国文学史》第2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中,以200多个页码的篇幅,兼用编年体史论和题材类型范畴,论述歌德青年时期、古典时期与晚年这几个时期的诗歌、戏剧和叙事作品,特别是对《浮士德》做了非常深入而独到的解析;而顾正祥的《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辑录1878-2008年间歌德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书信的的译目,并就辞书、文学史、合集、专著和论文五个类别收集归纳中国的歌德研究成果,且以附录形式列示日俄欧美歌德研究汉译书目等,展现了一幅歌德在中国的全景图,为歌德译介与研究工作的展开提供了极大的文献和索引便利,是一部专精的学术型工具书;叶隼的《歌德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

出版社，2013），梳理了歌德学研究在德国语境中的四个发展阶段，研究了歌德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与学术史意义，在讨论中国的歌德学研究成果时，还兼评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问题等。

此外，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 1773—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则是在汉语语境中，首次系统梳理了 1773—1945 年间自歌德在世时期直至第三帝国时期这五个阶段歌德在德国的接受史，提供了清晰的史论线索与论证材料；而王炳钧的论著《歌德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945 年以来的德国接受史》（Frankfurt am Main etc.：Peter Lang Europa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91），研究维特形象在精神史研究和新方法论维度中以及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文学史中的历史变迁等，具有研究范式的重要启发意义。

在简要评述歌德研究与歌德汉译研究在中国的代表性成果之后，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歌德译介与研究的现有成果基础上，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才有可能寻得相关的突破点与延展方向。

3. 着力的方向

歌德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接受，要寻求突破的空间，首先必在推出《歌德全集》译本，而且是《歌德全集》汉译评注本，其次也在推出有个性、有深度的歌德作品汉译研究成果。

推出《歌德全集》译本，乃至评注版《歌德全集》译本，正是本选题与既往歌德译介成果最显著区分的地方。

推出《歌德全集》汉译评注本的充分理由：

- 1) 歌德在中国的译介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依然缺乏《歌德全集》汉译本。
- 2) 国内相关成果的成功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田德望翻译、评注的《神曲》等。
- 3) 经过德国著名学者推荐和我们自己的勘察，我们选定了德国经典作家出版社出版、至 2013（1999）年出齐了的笺注版《歌德全集》（40 卷）作为我们翻译和评注的底本。《歌德全集》的翻译与评注工作，具备必备的、恰切的先决条件。
- 4) 为了“《歌德全集》翻译与歌德作品汉译研究”这一重大项目顺利开展与高质量地如期完成，我们具有强有力的力量保障：
 - 我们有一支年富力强、翻译与研究能力专深、学科配置合理、国内外通力协作的一流项目团队。而且，团队在歌德译介与接受研究两方面均有突出的成果体现，积累深厚。
 - 项目所在的德语学科，已有近 60 年学科积淀；团队所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为项目的实施与完成，可提供人力、财力与物力上的大力的支持与充分的保障。等等。

4. 主要工作内容

本课题以德国经典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40 卷本）为底本进行翻译与评注。要解决的总体问题是：以《歌德全集》的翻译与评注为工作核点，兼顾歌德作品的汉译研究。

项目翻译内容涉及歌德的诗歌、戏剧、小说、自传、游记、日记、书信、谈话、美学论著、自然科学研究论著、文牍和歌德完成的翻译文字，同时涉及《歌德全集》笺注的选译。此外，《歌德全集》汉译本的注释方面，尚包括本课题团队成员所作的译注。

5. 预期功效

- 1) 本课题将通过《歌德全集》的翻译，在中国语境中呈现一个全面的歌德，将他在文

字里体现的多个侧面、多个层次、多个形象，真实、完整、立体地带到在中国受众面前；

2) 通过相关评注的翻译，将歌德研究在德国的最新成果，带给中国的歌德研究界；

3) 通过本课题翻译团队自己的评注，并引入国内的歌德学研究积累，切合具体文本地促成中德歌德学研究成果（研究视角、方式方法、研究范式、研究认识与问题等）的对话交流；

4) 提升中国日耳曼学作为外国日耳曼学与德国或德语国家日耳曼学对话和交流过程中的学术与文化话语权。等等。